

郑观应人才观论略

黄振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广州 510610)

【提 要】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人才观,大致包括人才的重要性、如何培养人才和培养何种人才三个方面,并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颇具借鉴意义。诚然,郑观应的人才观也有其局限性,值得我们认真清理和总结。

【关键词】郑观应 人才观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 (2002) 05—0073—06

近代中国,举凡主张革故鼎新、强国富民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都是注重发现、培养和造就人才的。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把人才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人才思想是他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人才观是当时中国社会认识人才问题的侧影。他对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问题,都作过具体阐述,提出颇有见地的看法。本文就此试作简析。

一、关于人才的重要性问题

人才是人类的精华、时代的精英,是社会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古往今来,尽管多少有识之士对人才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就是都能认识到人才对治国兴邦的重要性。郑观应也是如此。

郑观应把人才摆在关乎政权更迭、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审视。他认为:“所谓为政贵在得人,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者,此也。”^①他指出:“国家之盛衰,在于人材”^②。郑观应之所以能认识到人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大致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对中国国情深切的了解。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国难深重的年代。他出世的那年就是英国威逼清朝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那一年。该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司法等主权,开创了资本主义列强用条约的形式“合法化”地掠夺和奴役中国的先例。随后,爆发了英法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样,中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刺刀和大炮打开,世界列强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风潮,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郑观应耳闻目睹了国家日益沦丧的社会现实,熟谙社稷国情之艰辛,深有感触地说:“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③他认为“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由于怀私,怀私由于行政专制,只知利己,不知爱国。不知爱国,则不能合群,人

心涣散”^④，致使“吾国今日四分五裂，几不成国。”^⑤郑观应通过对国情民意的了解和分析，已经充分认识到，世界列强和封建军阀是造成中国日益衰败的根本原因，但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未能举贤用能治理国家。他以国会议员的选举为例，说：欧美各国的议员选举，是推举有道德、有学识、有经验、且能代表民意的人来担任，“吾国则不然。自民国以来，每逢选举，无一不由于运动。遂至珍重有才之士，则鄙薄之而不屑为；而桀黠者流，则相争而靡已。一邑如是，一省如是，即推之各省，亦莫不如是。所以一开国会，麇集京师，遂成一丘之貉。”^⑥他认为，国家和民族之所以不能振兴，除了列强侵略，军阀专制的因素外，“然议员亦难辞咎也。”^⑦

其二，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郑观应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英语，“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⑧，对西方国家的情形已有所了解。随后，他通过经商，往来于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并与美国、德国等国家有商务往来，还经常辗转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厦门、重庆、桂林等地，对世界大势尤其是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作过调查研究，对其用人问题有所体察，深感到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列举了美、英、法、德、日等国家于近代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关键在于人才。他说：“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⑨。他还联系到中国的实际，说：“方今强邻环视，若无人材，势难自立。倘仰人保护，必利权旁落，不继波兰必蹈埃及覆辙矣。”^⑩

其三，对历史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我国的人才思想渊源久远，极其丰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有能则举”、“选贤使能”的主张。^⑪及至近代，人才思想更有进一步发展。如梁启超就指出：变法之本在于培育人才，“盖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⑫。对于我国人才思想的精华，郑观应很注重吸纳，认真总结。他说：“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设学校以教士，授井田以养民。……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⑬他还联系国内外形势，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作了对比论证，阐明印度、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养失道，缺乏人才，致使衰弱沦亡；而英、美、法、德诸国之所以昌盛发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于是，他得出了“人材众则百事兴”的结论。^⑭

郑观应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对比分析，联系到我国的现实，指出：“‘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才，开诚布公，与民更始。”^⑮

郑观应在探究古今中外培养人才的经验教训中，某些看法虽有偏颇之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他始终把培养人才作为强国兴邦之要道，这一点是非常可取的。

二、关于如何培养人才问题

关于人才培养问题，由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其途径不一，环节有别，方法各异。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培养人才呢？郑观应广泛地研究和考察了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人才培养状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其独特的思考，提出了

自己的主张。

第一，“蒙养”。郑观应这里所指的“蒙养”，主要是指家庭启蒙教育，特别是“母教”。他说，中国不想富强则已，若想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为什么要强调“母教”？因为“襁褓之婴、孩提之童，亲母之日多，亲父之日少；亲母之性多，亲父之性少。由六七岁有知识，以迄十二三岁，天性未漓，私欲未开，母教之如种花蒔果，灌溉栽培，先养其根本。教子女亦然，凡衣服、饮食、嬉戏、步趋，皆母得而引导焉、指授焉、勉励焉、节制焉。”他还认为，在启蒙阶段，如果母教教养得好，则容易成才，若教养不好，则难于成才。他还以孟母和欧阳修之母教子成才为例，说明母教蒙养对成才的重要性。^⑩

第二，兴学。兴学育才，是郑观应一贯的主张。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⑪又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⑫因此，他把办学作为培养人才最重要的途径。他认为，办学就要举办各种层次、各种专业、不同类型的学校。普通教育方面，中国古代就设立有“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即设有各级学校。这种做法仍需仿效，但要结合实际需要有所发展，“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⑬。这些普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生物、格致、图画、体操、习字等。专业教育方面，要开办学、农、医、军事、艺术等各种专业学校，以更好地培养专门人才。业余教育方面，郑观应主张在职培训，认为这也是一种成才的方式。特别是对于“贫寒子弟，为急于谋食而不暇入学堂者，尤宜遍设半日学堂，或半夜学堂”，以供其学习文化知识，促其成才。^⑭

第三，从师学艺。这也是一种成才的途径。在育才的道路上，不仅学校教育能够成才，而且自学、从师学艺也可以成才。比如能当上能工巧匠、行家里手，也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因此，郑观应主张在各地“广开艺院，教育人才”，或广设工艺厂，以供贫苦者和无业者从师学艺，这样既可自食其力，又可提供给聪慧勤奋者成才的机会。

第四，学习外国。人才培养的渠道和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向外国学习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郑观应说，“旷观东西各国，学校如林，人才蔚起，百艺繁兴。”^⑮因此，我们可以仿效外国，向外国学习。如航务方面的人才，他赞成在招商局设立公学，像外国的做法，“造就航务人才暨职业教育”，这样，“他日人才辈出，乘长风破万里浪，与欧舶美舰并驱争先，为我航业放一异彩。”^⑯

郑观应不仅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主张学习外国的精神文化和伦理道德以育有用之才，甚至主张“借才异域”。但是，他认为，向外国学习，首先要打好本国的文化思想根基，不能全盘照搬，“则其学西学必能弃其所短，取其所长矣。”^⑰只有这样，才能为我所用。

第五，奖惩分明。为了培养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才，郑观应极力提倡运用赏罚等手段，以激励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他认为，学校教育，培育人才，必须“奖其勤而惩其惰”，“小善必赏，小恶必惩，事事认真，谆谆教诲”^⑱，只有“取品行兼优、固穷守道之君子为之奖励；其品行不端、罔利营私者则惩罚之，庶能挽回薄俗匡正于世道人心也。”^⑲郑观应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的奖惩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古时的“论功行赏”、“无功不受禄”等，就是一种激励机制。而郑观应的目的，就是通过奖惩的方法，挖掘、造就更多更好的人才。奖与惩是人才培养和使用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必须兼而用之，运用得当，奖惩分明，言而有信，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三、关于培养何种人才问题

所谓人才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郑观应人才思想的核心也是这个问题。在现实社会上，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的分类上，就有从行业上、知识上、智力上、学科上、级能上、个性上和德才比重上等划分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都从不同的角度作用于社会。郑观应在考察国内外的人才状况时也领略到这一点。所以，他主张应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加以择才育才。

（一）“人才以道德为本”。郑观应对于育才、选才、用人，主张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和原则，并且要把“德”放在首位。他说：“学校者人才之所出。然人才重人品尤重，必不为财色所困，若徒养成无品之人才，不如无才之为愈。”^⑧同时又指出：“人才以道德为本，诚古今不易之论。”^⑨他列举了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关于以德育人的论述后断言：“有道德之国则兴，无道德之国则亡”，“盖长治久安之策，非道德无以植其基，中外无二理也。”^⑩他对人才的理解是，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人者，有道德、有学问、有经验之人也。”^⑪在这里，他也是把道德摆在头等位置。

郑观应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商务的人物，又身处在社会污秽堆积、世风日下的环境下，能如此看重“人品”“道德”，并坚持和倡导以德为先、全面育人，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二）选用多元人才。在人才培养教育上，我国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不少弊端。如教育培养的途径单调、内容陈旧、知识面狭、方法简单、结构不合理等，更突出的是在“量才取士”方面没有一个严格的切实可行的标准。因此，郑观应对古之育才用人曾作这样的评说：“降而唐、宋，严于取而宽于用。始省考试，斤斤然拘于一格。至今因之，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沉沦；其用士也宽，则庸佞无不忝窃。”^⑫他在这里明确指出三点：一，过去考试取才“拘于一格”，未能博揽人才；二，取才只看重“科甲”，未能重用博学多才之人；三，考取人才虽严，但使用人才过宽，致使“庸佞”之徒有机可乘，混迹其中。基于这种状况，郑观应主张“量才取士”，要不拘一格选用各种类型的人才；并且，“无论一才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⑬

1. 从政人才。从政的人才对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选取这方面的人才极其重要。正如郑观应所指出：“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⑭所以，对于从政人才必须“以慎选之，以严核之”，使其真正树立“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对他们认真管理，严格要求，“赏必当功，罚必当罪”。这是因为“而致治之道，莫切于亲民之官；生乱之原，莫急于病民之政。所谓天下得人则天下治者，此之谓也。”^⑮

2. 军事人才。军事人才是保国安邦之干城，是军队之栋梁。郑观应说：“今夫定天下以武功，而治天下以文德。……夫儒以治天下，农以养天下，工商以给天下，而无兵以卫天下，不能一朝居也。”^⑯因此，“有治法尤贵有治人，务宜慎选将才，任以军事。”^⑰那么，如何选取将才？他提出：“诚能分门别类，取精用宏，当于武科中亦列三等，以取将才：一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问算学、格致、机器制造，以穷其

造詣。三考測量槍炮高低命中及遠，以盡其能事。其能集眾長者，不次超遷，以示獎勵。專工一藝者，量才授事，以廣旁求。”^⑧鄭觀應除了對考取將才提出上述意見外，還對軍事人才的任用、用兵布陣、安內攘外、固守海疆邊防等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3. 外事人才。一個國家要與世界各國交往，少不了外事人才，而外事人才的素質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國格和國威。因此，鄭觀應特別注重對外事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但是，近百年來，中國的國勢日下，遭人鄙視，這除了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原因外，外事人才素質低下也是一個因素。鄭觀應深有感触地說：“‘朝廷大員多屬年老之輩，遇事遵守成例，粉飾因循，不求遠效，苟且目前之安，動謂年已老耄，中外有事，彼不及見。凡中外交涉案件總以羈縻推委、敷衍了事為能，只知聚斂節省經費以媚上。外觀均以為老成持重，清、慎、勤三者俱備，可謂公忠體國矣。’殊不知國家積弱皆誤於此輩。”^⑨他深刻地揭露了當時官場政界之怪現狀，贊同在“出使、駐洋”等公務方面，應“破格廣羅人才，以備任使。”^⑩但應培養和起用什麼樣的人才？他認為，“為使臣者，非才德素著，胆識兼優，持大体而敦藝節，達時務而諳西律者，斷難勝任”。鑑於近代以來，我國出國經商貿易和當僱工者日多，鄭觀應還建議“凡有華民寄居之地，亦設公使、領事，遇有欺凌等事，照會其地有司，悉遵公法以審是非，援和約以判曲直。倘華人有滋事不法者，亦循法懲辦。”^⑪

4. 商務人才。按照以往士、農、工、商四界的排序，“商”是排在末位。那麼，“商”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應處在何等地位和作用？鄭觀應在其《商戰上》一文的附錄《滬報〈變通商務論〉》的夾注中認為，“商賈雖為四民之殿，實握四民之綱。士有商則行其所学，而學益精；農有商則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則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國，豈可視為末務！”^⑫在這裡，他把“商”擺在“四民之綱”、“足以富國”的地位，由此可見培養造就商務人才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培養商務人才？鄭觀應主張：一，要破除對商務“不屑與之為伍”的士大夫惡習，徹底轉變輕商的觀念；二，設立各級商務領導機構；三，商務機構（商務局）兼設商學，分門別類，“以教殷商子弟”；四，廣設學堂，悉心教誨；五，學習外國商賈的做法和經驗，為我所用。這樣，我國“自能人才輩出，日臻富強矣。”^⑬

此外，鄭觀應還對教育、科技人才等的培養和使用作過論述。他主張教育人才既要有專長，又要有較廣博知識，更要掌握“切時之學”；科技人才要盡其所長，各專一藝，“論其藝而不論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資格，精其選而不必定額數”^⑭。特別是他對創新人才、科技創新等也有精要闡述。他說：“中國人才雖眾，格致未精，每制一器一船，我方謂為新奇，彼已嗤為陳腐，邯鄲學步，何能精妙入神。惟有竭慮殫思，標新領異，進而彌上，青出于藍，或不致倚人為強，而籌邊有備耳。”^⑮他的這些見解都是有獨到之處的。

（三）培養婦女人才。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國婦女遭受了封建宗法社會束縛和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壓迫，根本沒有應有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的權利，因此，婦女教育和婦女人才的培養成為近代中國一個極其突出的問題。正如鄭觀應所說：“朝野上下間，拘於‘無才便是德’之俗諺，女子獨不就學，婦功亦無專師。其賢者稍講求女紅、中饋之間而已。于古人所為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有其名無其實。”^⑯於是，他主張中國必須匡扶政化，興利除弊，加強對婦女的教育和人才的培養。

鄭觀應引證西方國家事例說，“泰西女學與男丁并重：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訓以讀書、識書、算數等事”，瑞士准許女子進入大書院習醫，俄國特設“教女收生院”，而“中國之人生齒繁昌，心思靈巧，女范雖肅，女學多疏”。不僅如此，還有

“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他深感同情地说：“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觐沈灾。”^④

对于这样残害妇女的陋规，郑观应主张要坚决革除，并提出教育妇女和造就人才的具体做法：一是要“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二是在社会广筹经费，增设女塾，使更多妇女有入学机会；三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的书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四是由地方政府官员检查督促，奖勤惩惰；五是对“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⑤郑观应的这些主张，尽管在现实社会中未能一一得以落实，但却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对妇女教育和妇女人才培养起着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处于封建专制、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他能为妇女人才的教育培养直言不讳，是值得称道的。

综上所述，郑观应对我国培养和造就人才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对当时中国社会培养、使用人才有重要参考价值，就是对于当今我们培养、选拔、使用人才仍有借鉴意义。尽管如此，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郑观应的人才观仍有其局限性。如：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未从根本上触动的前提下，他颇指望“朝廷”举能用贤，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修身立己”的训示，这是难以见功成效的。又如：他提倡对妇女教育培养也未摆脱“三从四德”、“相子佐夫”之窠臼，等等。这里指出其局限性并非苛求于前人，而是期以总结辨析、取良存精。

注释：

①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462页。以下凡引自本书者，编者和出版机构均从略。

②《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242页。

③《郑观应集》（上册），第436页。

④《郑观应集》（下册），第303页。

⑤⑥⑦《郑观应集》（下册），第314页。

⑧转引自夏东元著《郑观应传》（附录二：郑观应一生经历记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272页。

⑨《郑观应集》（上册），第480页。

⑩《郑观应集》（下册），第218页。

⑪⑫转引自孙密文著《人才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2页、第20页。

⑬⑭《郑观应集》（上册），第479—480页。

⑮《郑观应集》（上册），第481—482页。

⑯《郑观应集》（下册），第264页。

⑰《郑观应集》（上册），第245页。

⑱《郑观应集》（下册），第270页。

⑲《郑观应集》（上册），第267页。

⑳㉑㉒㉓《郑观应集》（下册），第243页、第260页、第260—261页、第250页。

㉔参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88页、第110页。

㉕㉖《郑观应集》（下册），第250页、第252页。

㉗㉘㉙《郑观应集》（下册），第415页、416页。

㉚㉛《郑观应集》（上册），第104页、291页。

㉜㉝《郑观应集》（上册），第352页、第355页。

㉞㉟㊱《郑观应集》（上册），第137页、136页、第105页。

㊲㊳参阅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议》，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68页、第369页。

㊴㊵㊶《郑观应集》（上册），第125页、第593页、第596页。

㊷㊸《郑观应集》（上册），第292页、第134页。

㊹㊺㊻《郑观应集》（上册），第287页、第288页、第289页。

（责任编辑 江中孝）